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 2010
(第9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9)

农村舆情的生成机理分析

欧三任

(湖南警察学院 侦查系,湖南 长沙 410138)

摘 要:农村舆情的生成机理是由农民的交往方式和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议论式、"圈子"式、中心式和输入式是农村舆情的具体发生方式,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经济、生活、安全因素则是农村舆情发生的直接诱因。农村舆情的发生具有易变性、功利性、随意性、分散性和趋同性特点。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要始终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矛盾纠纷的化解要抓住矛盾及舆情发生的初期阶段,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舆情调控的最有利时机。

关键词:农村舆情;生成机理;发生方式;诱因

中图分类号:D6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0)04-0053-06

农村舆情是农民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发展所持有的情绪、看法、意见和态度[1]。具体说,就是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农村治理和建设,农民所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及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农民的分散性和农村特定的生产生活习惯,决定了农村舆情在生成机制上的乡村特色。把握农村舆情的生成机理是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依据。

一、农村舆情发生的方式

舆情在其性质上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乡村社会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交往形式决定了农村舆情的发生方式。

议论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闲谈历来被视为农民所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议论不仅只是一种放松的休闲活动,其亦是农民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由于出自利益追求、共同兴趣或其他各种动机,往往原意打听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意见告诉熟悉的人,在彼此交换观点中使意见由少数人向更多的人扩散。无数这样的相互聚合、相互转告,就使舆论象追波逐流的河水那样在社会中加速流动"[3]。农村舆情就是经过农民七嘴八舌的议论而形成,通过相互交换而不断丰富,也借助于不同场合的议论而使舆情得以传播。农民议论式舆情的发生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议论的地点,二是议论的事项。前者主要见诸于农村的集市、酒肆、商店、卫生室、农村公众人物家中、田间地头等人员聚集的部位、场所。而引发农民议论的事项则常常是特定的。一是关涉绝大多数农民利益的政策和决策。如惠农政策的实施、有关农村经济布局实施的措施等。这类"事项"几乎涉及每一个农民的利益,一段时期内成为农民各种场合议论的焦点。由于为非正式场合的发言,农民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各种情绪、看法都可以得到自由表达。二是突发事件尤其是有可能招致农民生产、生活受到重大损失的突发事件。这类事件主要有重大刑事案件、卫生事

收稿日期:2010-09-0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课题(07C037)

作者简介:欧三任(1968—),男,湖南宁远人,湖南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内安全保卫和情报信息.

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和坑农害农假农资产品事件等。这类舆情具有生成快、意见统一的特点。舆情较为集中反映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不满。三是敏感事件。所谓敏感事件,主要是指相关事件中关涉人、事、物、时间、空间等敏感要素。如村民与村干部的对抗,或村民围攻政府机关的对抗行为等。这类舆情虽然是在议论中产生,但是由于事件含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议论往往局限于熟人中间的"偷偷"议论,其情绪与看法不敢公开。这类舆情信息隐形于乡村社会中,不易把握和捕捉。

"圈子"式。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内部分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农民一般会按照会友的方式开展聚会和交流,农民习惯将这种分类的群体称为"圈子"。尽管从舆情发生的形式来看依然是议论式的,但其形成的看法和情绪更多地取决于"圈子"所吸纳人群的素质和兴趣,故我们将这种农村舆情发生方式定义为"圈子"式。在农村"圈子"的划分并不全然依照经济条件这个唯一的标尺,时常还按照地域、组族和爱好甚至性别而区分。"圈子"不同,其所关注的事件也不一样,所形成的舆情水平参差不齐。"圈子"内部通过议论而使成员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与观点一般是不往"圈外"传递的。"圈子"与"圈子"之间混合讨论的情形更是极少存在,即便是不同的"圈子"要借助于相同的场所开展讨论,也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先来了,将地方占住了,另一个'圈子'里的人就不参加进来"[4]。"圈子"产生的舆情一般具有相似性,大家所持的态度也基本一致。通常,圈内产生的舆情信息只限于圈内人群知晓。

中心式。即以农村精英为中心所形成并传播的特定舆情发生方式。传统上我国历来有着精英主导乡村社会的习惯。农村精英在乡村社会有着一定的权威,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其有着主导着农村重大事项的话语权。这种权威既来自于习惯,也缘于农民广泛的同意。由于受制于文化素质和闭塞的自然环境,农民缺乏自主认识的习惯,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大家会附和和趋同来自于农村精英的观点。传统的农村,"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5]。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旦遭遇到未曾遇见过的事情,农民经常求助于农村中的精英——或是受过更多的教育,或是见过更多的世面,亦或是有着更多的阅历。精英的看法往往为农民所认可并沿着人际脉络向四处散播开来,于是精英的态度遂成为普遍性的态度。以精英为中心的舆情生成方式在农村有着一定的普遍性。

输入式。农村舆情的发生并不完全都始自于农村内部,尤其是对"三农"等深层次的问题,农民把握不定,也难以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这时外界的观点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输入到农村社会内部,为农民广泛认同和接受,进而成为农民的意见和态度。这种输入式舆情的产生主要基于两种渠道。一是信息媒介的传播。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媒介极为发达,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有关"三农"问题大量公开的报道、传播,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农民所接受和赞同。二是农民工的舆情传输。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得益于城市丰富的信息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农村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农民工返乡时与农民所获得的其他成果一并带回了农村,并在农村不断传播、扩散,成为农村舆情的一种重要生成方式。其中来自农村外部表达农民不满情绪的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最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和传播[6]。

二、农村舆情发生的特点

农村舆情特定的生成方式,决定了农村舆情的生成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易变性。农村舆情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发生阶段,农民的看法和情绪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中。由于权威信息的缺失,农村舆情产生所依据的中介事项往往是模糊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要归因于农民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无法从充满信息噪音和虚假信息的海量信息环境

里识别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农村信息传播渠道残缺，农民大多时候获得的都是经由人际脉络口耳传播的道听途说式的信息。尽管当前在人际脉络传播中注入了手机短信、电话等现代化元素，但仍改变不了口耳相传的本质。众所周知，口耳传播中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信者都是依据自己的需要来裁剪和构建信息的，所以人际传播的信息是极容易失真和变异的，这就导致农民获得有关事件的信息或者残缺不全，或者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或者是传播者杜撰的虚假信息。更重要的是，口耳传播信息处于时时刻刻的不断变化中，农民这一刻获得的信息与过去一刻获得的信息迥然不同，依据相关信息形成的情绪、看法、评价也必然处于不断变化中。

功利性。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现代化的推进不仅没有使农民享受到生活稳定与安逸，相反在被不断边缘化的趋势中，农民的安全感日渐式微。“农民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7]73。农民被剥夺的状况也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加之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不可预期的风险，时刻危及到利益乃至生存，于是关心眼前既得利益仍然是农民最主要的选择。因此，农村舆情都较为集中的发生在那些与农民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和事件上。

随意性。随着“家户”经济的恢复，农村回到了分散的生产生活状态，没有吸纳他们的组织，也没有正式的政治生活，农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意的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和非严肃性。当然，随意表达的舆情很少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更谈不上传输到政治决策系统中去。对这种随意性舆情表达农民喜欢用“闲谈”二字予以概括。不论事件与农民的相关程度如何，利益价值涉及有多大，农民对事件的看法和评价都可以表现为在不经意的场合与他人的议论中脱口而出，不需要深思熟虑。只不过，事件大小不同，所引起的议论范围和热烈程度不同罢了。此外，农村舆情的随意性还表现在舆情内容的随意改变上，农民对有关事件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得到不同的信息，就会发生不同的舆情内容，有的观点前后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也正因为随意性的原因，导致农村舆情中常常谣言大行其道，虚假舆情和错误舆情充斥其中。

分散性。农村舆情产生的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村舆情产生的随意性决定的。农民对自己所关心的事件，尤其是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不断与他人议论、交谈，从而形成自己的情绪和态度。而这种议论可以在乡村社会中的任意一个场所或空间发生。按美国学者威廉·施坚雅的观点：“小农的实际生活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7]77尤其是集市上的茶馆、酒肆等休闲场所既是贸易场所，也是社区政治场域，满足了乡里人的社交、休闲和表意的需要。弥漫于其间的便是最具典型特征的农村舆情了。在今天，当电话、手机成为农民的主要通信工具时，舆情还能跨越空间的限制与远在城市务工的亲人、好友进行实时互动和反馈，舆情产生和传播的边界得到无限的拓展，其分散性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趋同性。因为文化素质和习惯的原因，农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少有自己的主见，趋同性成为农村舆情产生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种趋同性在舆情的发生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趋向于农村精英的意见和看法。农民缺乏自信心，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自己有一定的看法也容易动摇而难以坚持，尤其怕不正确而贻笑大方，所以舆情一经产生就有着趋同于农村精英的趋势，这样无论是在乡村内还是乡村外风险较少，不至于受到批评乃至于行政或法律的制裁。尤其是当农民对某些事件把握不定时，农村精英成为了农村舆情的源头，农民的意见总是在仿造或复制精英的意见和态度。二是少数人的舆情趋同于大众，即转而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少数人的意见强行压制在心底，使农村舆情在产生阶段呈现“沉默的螺旋”现象，于是不同舆情观点逐渐消失，一致的高度趋同的舆情观念渐渐占据舆情的全部空间。

三、农村舆情发生的直接诱因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生活、安全等因素是农村舆情发生的直接诱因。

政治诱因。党和政府制定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以及基层民主政治运行因为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村舆情最主要最直接的诱因。其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是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对农村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直接涉及农民各种利益,因此每当新的"三农"政策出台都受到了农民极大的关注。一项针对2278位村干部有关7个"三农"问题的调查表明[8],村干部关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的占97.6%,关注"各级党委政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的"占86.2%,关注"农村各种民生问题摆到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占72.3%,关注"对农村投入的各项资金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占71%。二是基层民主政治。基层选举是"村民自治"最为重要的环节,决定着乡村公共权力的归属以及由此拥有的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力,因而基层选举期间是农村社会政治生活最为浓郁的时期,农民各种意见和建议在选举中表露最为直接。三是干群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成为显示农村舆情的重要窗口。农民对干部和党员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党和政府农村政策及其治理工作的评价。但改革开放后,由于基层干部和村干部侵占公共利益、贪污受贿行为的增加,导致干群关系恶化,对基层干部的低评价和不满情绪在农村中占据农村舆情的重要方面,反映对村干部不满情绪的顺口溜在农民中广为流传。

经济诱因。关心眼前的现实利益是农民利益价值观的重要特点。因此,农村利益调整和侵农坑农事件最容易激发农民利益保护意识,是农村特定舆情发生的直接诱因。显失公平的利益调整和剥夺农民利益、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往往会引发民怨沸腾,农民有时迫于外来压力,特定的看法和意见不敢表达出来,但一种隐形的消极情绪就此诞生并在乡村社会的一定空间内蔓延,如果此时对舆情不加以疏导,极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当下农民特别关注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一是征地补偿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城市扩张和重点工程建设方面,农民土地征收和安置问题直接关系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是农民议论集中、利益主张最为坚决的领域。农民普遍反响激烈的是强行征地、补偿偏低、补偿不到位、农民安置不到位等造成失地农民生存困难、发展困难的问题。二是公共收益的分配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资源转为市场资源而使乡村有了一定的公共收益。如何分配公共收益也是农村舆情关注的重点。目前农村舆情对此反映在于村干部对农村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侵占问题,也就是贪污问题。三是劳资对立问题。劳资对立是随着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农民工身份而凸显出来的。劳资问题核心在于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而工资过低。不仅如此,微薄的工资还常常得不到保障。"总理为农民工讨薪"一度成为农民热议的话题,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工在劳资矛盾中的弱势地位。四是经济负担过重问题。农业税费问题曾一度是农村舆情反应最为集中最为强烈的领域,但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村税费而逐渐变得不再为农民所重点关注。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农村家庭教育与医疗负担过重成为新时期农民议论的焦点。

社会生活诱因。转型期的农村打破了原有的闭塞状态,乡村生活因此变得日新月异。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所存在的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挑战,尤其是一些问题的产生与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建设规划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农民的生活又须臾不可分离,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安居乐业,激起农民的议论并由此形成一定社会政治态度。主要问题有:(1)环境污染。环境恶化、农田污染、生活用水污染、地面下沉等严重威胁农民生产生活的环境污染事件逐渐增多,因为

环境恶化导致农民失去家园、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或是导致农民突患危险性疾病的事件增多，农民对此反应越来越强烈，成为舆情危机爆发中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2)宗教邪教问题。当前宗教信仰在我国农村处于快速扩大的态势，农民信教人数急剧增加。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该不该信教，信仰什么宗教？很多农民在宗教面前一直怀抱有举棋不定又惴惴不安的心理，亟需我们在舆情领域进行引导与调控，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宗教和正确对待宗教信仰行为。(3)宗族迷信问题。伴随农村经济发展的是宗族迷信在农村也快速复兴起来。新时期宗族迷信活动吸收现代化的因子，改头换面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其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处置这些封建残余，将直接决定着农民对待宗族迷信的态度。(4)婚丧嫁娶问题。婚丧嫁娶引发了经济压力以及农民互相攀比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农民急切盼望政府予以引导和调整。

公共安全诱因。乡村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使农村进一步趋向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工业社会是个风险频仍的社会，尤其是转型期的农村极度缺乏风险防御机制，进一步放大了农村的公共安全问题，引起了农民对农村安全问题的特别关注，农民以舆情的形式集中表达了对国家有关农村安全监督与预防的期望。农民关心、热议的农村安全问题主要有：(1)食品安全。以儿童奶粉引发的农村“大头娃娃”事件引发了农民对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期望国家加大对农村食品药品打假工作力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2)黑恶势力。黑恶势力在我国农村正处于活跃期。黑恶势力通过各种途径，渗入到了基层组织，假借公共权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强买强卖，侵占农民利益，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安居乐业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成为农民的共同期待。(3)农资产品质量问题。农业是农民安生立命的根本，同时现代农业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的农资产品。但是，近年来一些商家和个人为牟取不法利益，向农民出售假冒伪劣农产品以及虚假的农业技术，导致农民绝产绝收的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对此颇有异议，成为农村舆情关注的重要内容。(4)市场风险问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屡屡遭遇国家定价、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等不平等待遇，农民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其中不满情绪处处可见。

四、农村舆情生成机理的启示

农村舆情的产生是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经济、生活、安全等重大事项作出的反应，传递着农民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可程度和态度。掌握农村舆情产生的机理，有利于了解农民的需求并由此提高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尤其有利于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一)新农村建设要始终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无论是农村舆情产生的具体方式，抑或是农村舆情产生的直接诱因，其中绕不开的核心要素是：利益，即农民的利益。农村舆情集中反映的领域和农村舆情最为活跃的领域，尤其是农民舆情反应强烈的事项几乎都集中在农民利益遭受侵害的领域。和谐农村的建设首先是农民利益的和谐，利益和谐的前提又在于对农民利益主体地位的尊重。如果农民利益继续遭到体制性安排的剥夺，那么舆情中的消极因素、对抗情绪会在农村不断蔓延，它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对党和国家认可程度下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甚至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怀疑态度，危及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始终关怀农民利益，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的创造性，为新农村建设创造有利的舆情环境。

(二)掌握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最佳时机

农村舆情产生最迅速，反应最强烈的是农民利益和权益遭受侵犯的领域。在利益遭受侵害初期和舆情发生的起始阶段亦是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发生之时。这时，矛盾本身和对矛盾激化有着推

波助澜的舆情尚处于酝酿阶段,也就是说这时无论是矛盾化解的难度还是矛盾化解的舆情环境都处于一种可以调和、谈判的阶段,无疑矛盾化解的成本是最小的,也是最容易化解的。倘若错过这个时机,任由矛盾扩大,民怨积累,最终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经验,因此必须始终坚持矛盾纠纷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的原则。但前提是,我们能及时掌握农村舆情的产生原因及其主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及时畅通民众的诉求渠道,有针对性地提出矛盾化解和利益调解的有效措施,才能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

(三)占据农村舆情调控的有利时机

舆情引导与调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舆情调控的方向主要指向对偏见、消极情绪、谣言、有害信息等非理智、非主流的情绪观点和意识形态的矫正与控制。农村舆情在其发生阶段具有模糊性和易变性以及消极情绪更为活跃的特点,因此舆情发生阶段的调整更具必要。同时农民的看法还处于变动中,也容易通过外部干预来矫正农民的观点,以形成正确的认识。因此,相关部门要建立对农村热点、焦点问题的舆情监测机制,要通过议题设置和适合于农村的特定宣传形式,向农民解释事件真实情况,传达党和政府对一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在舆情发生阶段和发源地进行有效干预和调控,规避农民因谣言、虚假信息传播而形成错误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 舆情信息工作概论[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3] 刘建明. 当代中国舆论形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5.
[4] 于建嵘.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10.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5.
[6] 于建嵘. 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J]. 决策咨询,2003,(5):44.
[7]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8] 姜作培,何春宏. 2278 位村干部生存状态调查[J]. 人民论坛,2009,(29):8.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OU San-ren
(*Reconnoiter Department*, *Hunan Police Academy*, *changsha* 410138, *chic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is decided by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farmers material production mode. Discussion type, "circle" type, central type and input type is the specific ways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occurrence. And farmers interests related to politics, economy, life and safety factor is the direct cause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occurrence. Volatility, utilitarian, randomness, dispersion and convergence ar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occurrence. It tells us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hould always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The countryside contradictory dispute's melt must hold the best opportunit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has the initial period stage. Simultaneously this time is also the most favorable opportunity to regulat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rural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mechanism; occurrence; incentives